
婦女勞工的關懷者： 林美瑤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張宗坤**、白祐誠***

紀錄：張宗坤

時間：（一）2020年5月13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二時

（二）2020年6月24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半

（三）2020年8月4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四）2022年1月18日下午二時至四點（視訊訪談）

（五）2022年3月12日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

地點：基層婦女勞工中心辦公室（台北松山）

林美瑤女士，1951年出生於高雄市，基層勞工家庭出身。1973年自東方工專美工科畢業後，陸續於時代百貨公司、東南水泥公司任企劃

* 訪談者按：訪談者要特別感謝林美瑤女士慷慨提供相關的檔案、資料、照片，為這份訪問紀錄添增鮮活的影像與詳實的史料基礎。同時，訪談者也要感謝史學敏在謄寫訪談逐字稿上的協助，吳靜如、莊舒晴詳讀後提供的調整意見，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的修改建議。本項訪談獲得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補助—戰後台灣客家工人的勞動經驗與族群文化：以遠東化纖新埔廠為例」支持。

** 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 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職務。1979年母親逝世後，至台北任《救世之道》雜誌編輯，再赴長老教會服務。1984年參加台南神學院母親節音樂會期間接觸到原住民議題，此後長期投入漁工、勞工的組織工作。1988年組織基層婦女勞工中心，專事國際女性勞工議題的譯介、女工的組織，以及移民與移工的收容安置。是次訪談請林美瑤女士懷想成長過程中的信仰、家庭與勞動記憶，及其與日後從事漁民、勞工和基層婦女組織工作間的關聯。

一、鐵路新村的童年勞苦

我是1951年出生，最大的姊姊大我兩歲，我是第二個孩子。第一個生了女兒後，我父母希望能生兒子，可是我還是女生，所以他們有一點失望。生到第三個女兒後，雖然又生了一個兒子，但出生沒多久就因為大病去世了。隔年又是一個妹妹，在這第四個妹妹生出來以後，第五、第六就都是兒子，我的母親才開始有了地位。

我母親是家庭工作者，都是她在照顧我們這些小孩。從小的時候，我就得照顧弟弟妹妹，我總是會對媽媽說一句話：「這是你的金囤(kim-kiáⁿ)」。¹因為母親特別照顧這些兒子，以至於她不覺得我們這些女生也要被保護。整個環境裡面，女生是被忽視的：我要做很多的家務勞動，比如說跟母親去種菜，用煤球來煮飯，幫弟弟妹妹洗澡，也要洗他們一大堆的衣服，或是一起挑水、挑糞，雖然母親總是把桶子移靠近她那一邊，其實重量還是

1 訪談者按：本文台語拼音係使用白話字(又稱教會羅馬字)輸入。

一樣的，這對我來說太沈重了。我跟家裡面最大的衝突，就是我的工作太多了。國中之後，我的身體變得不好，但是生病並沒有減少工作，我還是得要做這些事。雖然這麼說，那時代重男輕女，有母親的訓練，我才能在社會上有一技之長，母親確實影響我很大。

我的父親是鐵路局的，應該是機務段負責開火車的人，從南部開到台北，不是馬上可以回家，他通常會兩天不在家。我們住在鐵路局的宿舍，一間宿舍住了兩個家庭。別人家是從前門出入，我們是從後門出入。我們的左鄰右舍都是講日文，我最早也是在那裡知道二二八。我們社區有非常多二二八的受難者，有一個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師教他們社會主義，他們就全部都涉案了。那些歐吉桑會講說他們怎樣被刑求，我既愛聽，又覺得非常恐怖。

我媽媽跟我父親結婚，是台南神學院院長的夫人推薦跟做媒。一個院長夫人怎麼會認識一個女傭？這是因為我家跟女宣教師梅佳蓮姑娘（Kathleen Moody）的關係。我的阿公原本是在歸仁，因為做農沒辦法生活，阿嬤就必須帶十歲的媽媽過來長榮女中，她們都住在姑娘的家做她們的女傭，還得幫整個學校的女同學煮飯。媽媽做了十年以後，院長夫人覺得這個女孩子不錯，就許配給教會裡負責排版的人的大兒子。² 所以，我媽媽若要回娘

2 林美瑤女士的父親林清標和母親李金鳳是由滿雄才牧師娘瑪麗亞女士（Maria Montgomery）介紹，於1948年由滿雄才牧師於新樓醫院禮拜堂證婚。林清標時年二十四歲，李金鳳時年二十歲，後者當時與其母李朱蘭為梅佳蓮、劉路得（Ruth McLeod）幫傭。梅佳蓮（1920-2014）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倫敦大學，因醫師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的

家，是回去梅佳蓮的家。

二二八發生的時候，因為她們都不知道外面的消息，姑娘不方便出門，想說我媽媽是一個小女孩，軍人應該不會有戒心。姑娘要我母親出去「買一根蔥」，就是要買一點菜，人家才不會懷疑。媽媽出去的時候，湯德章已經被槍斃，曝屍在公園給大家看。³回來跟姑娘報告的路上，媽媽騎過勝利路，那邊的水溝很深，已經都站了一排拿槍的軍人，只有我媽媽一個人騎著腳踏車，軍人就要打她，媽媽只好舉手，車子就摔了。軍人跟著她回去姑娘家後，姑娘後來就被遣送回英國。軍方認為：外國人在這邊，就是給我們帶來問題。⁴

我去讀書回家後，母親問我第一句話就是「老師有沒有跟你講過二二八？」我說沒有，母親竟然就流眼淚了。因為她沒有讀過書，不曉得學校的教育是怎樣，但是她希望我們去學校是受到正確的教育，所以非常難過。她還會講很多二二八的事情給我們聽，比如說我們鐵路局的宿舍在當時變成了一個戰場，因為從台南到高雄火車站的這一條路，經過民族路會有一條橋，那座橋可以架上機關槍，掃射我們鐵路新村。⁵

介紹，結識當時就讀於西敏斯特學院的牧師黃彰輝，並在後者的介紹下來到台灣台南神學院從事音樂教育，直到 1985 年退休為止。見林美瑤。2013。〈林百萬與白話字〉。新使者，138，頁 63-68；安禮文。2014。〈台灣教會音樂的奠基者——梅佳蓮（1920-2014）〉。新使者，142，頁 50-53。

- 3 據中華日報報導，湯德章係於 1947 年 3 月 13 日因違反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罪，遭槍斃於民生綠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
- 4 關於林美瑤母親的二二八親歷，亦可見林美瑤採訪。1987。〈40 年前的街頭巷尾〉。台灣教會公報：活路副刊，1825，頁 17。
- 5 指民族陸橋，鐵路新村位於今日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大港街一帶，該橋樑則位於長明街以南的建國二路與民族路路口。

我們家是計件工，戰後，每個家庭都得作手工貼補家用，大家都把家庭當工廠。當老闆把貨送過來後，我們這些小朋友都要一起做一些。有些雜貨店會賣一個給你撕下來抽獎（thiu-chióng）的紙籤，我們都是分工做這個工作。我媽媽煮糰糊，父親用墊板把它割洞，洞的距離是固定的。一個人負責塗糰糊上去後，我跟其他人負責貼上標籤，那要一排一排地用魚鱗的方法疊下來。你得從最下面開始貼，然後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小小的手很認真地貼。收貨的人來卻說我們都不合格，他把成品拿走了，但不給我們錢。我很生氣地對媽媽說：「媽媽妳真的很笨，我們這麼認真做，他就是騙我們，妳還這樣做。」我媽媽對我說：「妳不懂，我們不忍耐就沒有辦法生存。」

我們家還有做聖誕節飾品的家庭代工。因為社區人很多，計件商人送一次貨，我們可以全部幫他完成，這是在剝削我們這些勞力。比如我們今天大家貼完了一百件，他來就會說他要扣錢，算它一件一元好了，一百件就是一百元，但他會給你扣掉一半，變成五十元給你。

在 1987、88 年，我做了一段很長時間的計件工。跟童年的計件工一樣，這兩份工作都很剝削。只是在台北的這個工作，跟我一起的女工不覺得被剝削，認為她有自由：我把自己機械化，就是來做計件，不要想太多。我在一間小工廠工作，每一個女工都不說話，一直做自己焊接的部分。有的女工還有孩子，她就會把電焊工具買回家，一面照顧小孩子一面做。可是跟工廠不一樣，她的家裡沒有把煙抽出去的設備，結果小孩子跟媽媽的鼻子都會發炎。看到那孩子，就想到我的童年。我想說的是：一切都沒有改變，她們一直被剝削。但是女工要改變，要不然妳的生命

就太痛苦了。

我一直覺得童年過得非常不快樂，都沒有去玩過，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那是沒有零用錢的時代，媽媽爲了鼓勵我們，就用香蕉做成餅乾，讓我們當成點心吃。去讀書是想說：我要認真地讀，老師講的我要記下來，不然我回家沒有時間讀書。我一直努力要掙脫工人的環境，我們太貧窮了，所以希望趕快賺錢，很小我就有這種心智。

二、語言與教育的衝突

我們家人都是一起做工作、一起讀書、一起吃飯，在一起的時候是很愉快的。那是在榻榻米的房間上面的一張矮桌，晚上睡覺得收起來，我們都坐在那裡寫功課、讀聖經，那張桌子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回憶。

在我們家，第一件你要學會的事就是讀聖經，還有吃飯要禱告。我們讀的是這麼大一本的羅馬字聖經，爸爸說讀哪一段你都要會讀。禮拜天我們一定要去禮拜堂，一早就自己走路去新興教會。我在那裡認識了彭明敏的叔叔彭清約，⁶他是我們主日學的校長，每個禮拜天都是做完禮拜才回家吃飯。教會的生活也是

6 彭清約(1888-1969)，台灣高雄人，1945年出任高雄市新興區長，1946年起以自家住宅爲禮拜堂開創新興基督長老教會，1948年就任長老職，歷任該會主日學教員與校長、幼稚園董事長等職。見蔡重陽。2009。《生生不息——高雄市新興基督長老教會設教70週年教會史》。高雄：新興基督長老教會，頁150-162。

很愉快的。我們會在復活節吃紅蛋、聖誕節演劇，我負責演老婆婆、演什麼的。小的時候對意義不怎麼瞭解，也沒有什麼樣很深的教導，只知道我們是信耶穌的，所以這個事不能做、那個事不能做。或是要孝順父母，但是我們沒辦法，就會頂撞父母。

我第一種認識的字是台灣話。要給媽媽爸爸寫字的話，不是寫漢字，我不會寫，而是用羅馬拼音寫，我會寫 góa-khì chhài-hng (我去菜園)……要用拼音寫這些東西，爸爸媽媽才看得懂。我第一個聽到的聲音也是台灣話，第二種聽到的是日本話，因為大家都在講，我小的時候就會聽這些話。我們對話有很多用語是日本話，像スリッパ (surippā, 拖鞋)、げんかん (genkan, 玄關)、トランク (toranku, 行李箱) 等等。開始有字的時候就是羅馬拼音，再來去學漢字，但我是很痛苦的。還沒有去讀書以前，們是很快樂的，大家都講母語，媽媽爸爸都會講日文，我們也聽得懂。開始去讀書後，我就不想講話，因為我不會講國語，爸爸媽媽也不會。我會被貼「我不會說國語」的牌子，非常地羞辱，最後乾脆去學校就不講。

那個時候，老師不是講我們聽得懂的國語，是很鄉音的，我們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什麼，所以老師跟我們之間的關係都緊張，可是你又必須要去讀書。整個教育讓我感覺它是負面的，課本跟聖經的教導差距很大，價值觀是不同的，我非常不喜歡讀這些學校的東西，可是又必須跟著它。我後來跟母親的衝突，就是覺得她的價值觀跟學校教的完全不一樣。我努力要脫離工人家庭的生活，最快的途徑就是經濟。我會想說：經濟狀況如果好，家庭環境就會改變，我的一生都是在等這件事發生，但卻落空了。所以後來外國友人請我去演講的時候，我想講的也都是這件事：到底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沒有照顧到這些很基層的人？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我讀書的每一年都是模範學生，有很多獎狀，而且一定是排名前面的，我非常有好勝心。小學一到六年級，我都是模範學生，初中三年的成績也都是很好的。我是高雄市立第九中學第二屆的畢業生，入學時的校長是杜萬才，畢業時換成許朝智。⁷後面這位許校長是一個很好的校長，他開始給我們帶入電視視訊的教學，你看有沒有很進步？反正我很喜歡我們校長，他會給你很新的東西。到了高中，我本來要被學校保送，但又不想去離家太遠的地方讀書，而且我坐公車會暈車，只想用走路的去學校。

三、信仰的見證

我們初中同學的關係到現在還是很好。那時他們都騎腳踏車，我是走路的，我會帶他們到我們的教會。我們新興教會後來去開拓了另外一個安生教會，正好在我們學校跟我家的中間，我

7 高雄市立第九初級中學，即今日之高雄市立三民國中，首任校長為杜萬才，任期自 1963 年至 1965 年 9 月；第二任校長為許朝智，任期自 1965 年 9 月至 1973 年 9 月。許朝智於抗戰期間考取復旦大學，戰後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在行政專校（即台北大學前身）、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後，服務於多所南部的中等學校。見高雄市立三民國中。2018。〈三民歷史〉。高雄市立三民國中（[url=http://school.kh.edu.tw/index.php?WebID=63](http://school.kh.edu.tw/index.php?WebID=63)），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18 日；徐天相。2002。〈用心、務實、寬厚、平易的校長－許朝智校長〉。高雄高工校史館（[url=https://www.ksvs.kh.edu.tw/v0/history/6_seniorsvisit/6_1_seniorsvisit.htm](https://www.ksvs.kh.edu.tw/v0/history/6_seniorsvisit/6_1_seniorsvisit.htm)），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20 日。

會約我的同學去那裡寫功課，那個時候也是很愉快的。教會的空間是可以打全場的籃球的，還可以讀書、寫功課，我都會邀我的同學過去，他們也知道我是基督徒。

安生教會的由來，是彭清約覺得應該要照顧高雄醫學院的學生，貢獻了一塊地，就在高醫的對面，弄了一個專門給大專學生聚會的教會。⁸ 安生最開始都沒有人，新興教會就安排了住鐵路新村的十個家庭過去開拓。這不是我們自己要，而是母會安排的：教會要有三十個受洗的成人會員，才可以成立一個堂會，我們這十個家庭當然還不夠。

我們全部的娛樂都跟教會有關。今天開一堂查經班，我們全部人都要去；今天有一個主日的聚會，我們都會去聚會。很小的時候我就跟著爸爸媽媽做教會的這些活動，他們回來，我們也一起回來，不可能把我們放在家裡，我們也不習慣這樣子。到了安生教會，我認識了高雄醫學院的學生，他們是我們少年團契的輔導。我們全家都在這個教會裡面，從小小的時候就都有工作：我的妹妹她們負責鋼琴的服事；我則要獻詩，要參加合唱團、教會的詩班，還要佈置聖誕樹，因為藝術的恩賜，我常常要做這些事情。

從小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跟教會之外的家庭當然有很大

8 安生基督長老教會，原稱「新興教會安生佈道所」，係於1960年復活節於高醫附近之日式宿舍開幕，同年10月再以愛國國小鄰近之透天厝為禮拜堂。該教會最初之會員，為新興教會指派鐵路新村以北之二十三戶，後於1971年升格為堂會。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年代不明。〈安生教會簡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url=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9015](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9015))，檢閱日期：2022年3月19日。

的距離，如果整間房子裡的每一個人都在拜拜，我們家是不拜拜的；每戶人家都有一個紅色的神龕，我們家也是沒有的，只有十字架。媽媽在我們還很小時就會講，「人家拜拜，你不要去看。人家在吃東西，媽媽也會煮給你們吃。」拜拜的那些東西有水、有香，拜得很嚴重。媽媽會教我們：那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你不可以去拜，最好也不要去吃。

其實，我們家原來也是拜拜的。我的阿公在十一歲失去了父母，就在鹽水幫人家看牛、牽牛去賣，叫做牛墟（gû-hi）。阿公是讀私塾漢學的，我阿嬤這邊則是有讀書的，但她們家卻在做拜拜、算命的事。阿嬤的爸爸是桌頭（toh-thâu），桌頭會用言語寫咒語、開藥方，跟童乩（tâng-ki）不一樣，童乩只會用亂刀劃傷身體，兩個是一搭一唱替神明發言，這都是騙人的法術。他那個時候就發了一個誓，他說：「我信你這個神明，我就是要做你這個工作，我們家三代一定不出丁。」他生了三個女兒，沒有生兒子，但他們家很有錢，三個女兒都被送到台南去唸書。

我阿嬤讀的是台南的長榮女中。她們三姐妹要從鹽水坐送甘蔗的台車，轉搭火車到台南，再走路去學校。因為家裡需要有男生來幫這三姐妹挑書，那個男生就是我阿公。因為這個孤兒他有信耶穌，我的阿嬤就決定要跟他結婚。其實，她應該嫁給醫生，她可是讀了女中的人啊。像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信了耶穌，生命也已經改變了，他們才會不選擇一般的價值觀，宣稱「我要嫁給醫生」，而是嫁給跟我同信仰的這一位林百萬先生。

林百萬就成為我的阿公，他只懂得一點漢字，一生都是做工人，他後來當台南《教會公報》的羅馬字檢字工人，在巴克禮

(Thomas Barclay) 宣教師手下工作。⁹ 我的爸爸出生時，我阿嬤想：她們家不是不出丁的嗎，怎麼會生兒子？這第一個孩子七個月就生出來，身上長了螞蟻，醫生來了就說，「這個孩子沒救了，不要養他。」我的阿嬤說，「一定要養，一定會養起來。」這就是信仰，信仰的見證就從這裡開始。到我們這一代又是個挑戰，我們家的第一個兒子死掉，原來我們還在這個「三代不會出丁」的魔咒裡面，你的信仰受到很大的衝擊，你信或不信？你要回去原來的信仰嗎？靠辦事你可以得很多錢，因為你騙人。我們都是經過這樣的操練，我們的信心好比金被火燒，是經過煉淨的，在痛苦裡面進了一步。

我的阿嬤生了蕭美琴的爸爸以後就過世了，孩子才會送給蕭家養。蕭美琴的爸爸剛出生時也可能會死掉，他是我爸爸的第四個弟弟，我爸爸是長子，他們兩個人差十一歲。這個小弟弟身體很虛弱，畢竟是生病的媽媽生出來的孩子。蕭家也很特別，他們自己生的孩子也都死掉了。他們想說，說不定這個孩子來我們家，我們就可以好好地照顧他。¹⁰ 大家都是經過了痛苦，才知道信心很重要。我們從小就有這種體驗，看到拜拜的時候雖然會懷疑：大家都在拜拜，我們都沒有，我們有沒有得到保護？但是慢慢地操練和見證，信心也會成長。

9 林百萬從事檢字工作的經歷，見林美瑤。2013。〈林百萬與白話字〉。新使者，138，頁 63-68。

10 即蕭清芬(1935-2021)。在蕭清芬出生未滿一年後，林美瑤阿公林百萬的元配李氏周逝世，該子則交由和美教會執事蕭楓領養。見林美瑤。2013。〈林百萬與白話字〉。新使者，138，頁 63-68。

四、領受美術恩賜

從讀書識字開始，我就知道自己有美術天份。碰到不會寫的字的話，我會用畫畫的。我給外婆寫信是寫羅馬字，比如說「阿嬤」我就寫成 a-má；我不會寫杼仔（luah-á）這個少用的字，我就會畫一個梳子，阿嬤看到信就知道在講什麼。從小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有很多的障礙，要聽懂台語、日語，又要聽所謂的國語，已經有三種話在我的裏面。我認得的國語也不是標準字，是像「我們的國家」那種你聽不懂的，¹¹ 我就把畫畫想成一種語言。

我選擇了畫畫，也很快地發揮專長。我的第一幅畫是畫左營的春秋閣。那時候的春秋閣很美麗，沒有什麼龍虎。這幅八號油畫就被人家用八百塊買去了，這是非常大的金額。本來我是要走純藝術的，後來因為生活的需要，我還是走了設計。之所以讀專科，是因為我們家必須要趕快改善經濟的條件；去讀東方工專，則是因為它有美術工藝科。雖然我有考慮過國立藝專，但為了分擔家務，弟弟也還很小，我是不能離開父母的，只好選擇南部的學校。那個時候我的系主任是很有名的顏水龍。¹² 其中一位老師的姨父是許文龍，他還帶我們去奇美小小的塑膠工廠參觀過。

讀專科的時候，我爭取到了獎學金。我最喜歡的是可以走路去火車站，再坐四十五分鐘的火車到學校。我那時就在教學生

11 訪談者按：受訪者發音為「ㄨㄛˊ、們的ㄍㄨㄥˊ 家」。

12 即今東方設計大學。顏水龍係於1966年9月受聘為私立東方工藝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教授兼系主任。見陳以凡。2012。〈生活美術的教育家：顏水龍的台灣工藝活動研究1930-50年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了，因為爸爸的關係，有一位大湖車站的員工讓我教他的兒子畫畫。對我來講，畫畫沒有壓力，花很多時間都不覺得累。雖然我也學過鋼琴跟小提琴，可是後來根本沒有時間練習，要是我們家的人都在，也根本沒辦法練，不像畫畫，什麼時候都可以畫。

我們每一年都要參加畫展，比如學校的聯合畫展，我參加了之後看到另一個醜陋面。有次我去台南參加比賽，我的作品一下子就入圍了。好巧不巧，看展的時候我聽到那些評審老師在問，「這幅畫是誰的學生？」他們大家都說「不是我的」，我的作品就被拿下來了。我想：得獎是不公平的。我畫畫不要爲了得獎，是要畫出意義。我不是他們的學生，得獎對他們沒有好處。後來我就很平淡地看這種得獎的事情。這個東西是上帝所不喜悅的，我以爲一直得獎很好，可是其實不是，你會因此驕傲起來。

五、時代百貨與東南水泥的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時代百貨公司(1972)，主要負責畫海報。那個時代印刷費很貴，海報都是用畫的。他們是在我們學校開了畫展後來找我的。看到我的作品以後，他們就叫我去那邊上班。雖然如此，因為董事長並沒有看到我，只有看到作品，要我當衆畫給他看，他才知道我有沒有實力。我在企劃課負責促銷，在百貨公司工作每天就是畫這些廣告，你要讓商品可以被買走。我的辦公室有十坪大，還可以吹冷氣，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我需要一張大桌子畫海報。這當然很讓人驕傲，畢竟畫畫的人才太少了。企劃課還有別的同事，但另外那個人他不那麼會畫，很會講

而已，他很緊張我的存在。

時代百貨就在高雄的中華路，那時高雄最有名的百貨公司是鹽埕區的大統百貨。我走進他們公司時，他們的員工就很緊張地請我進去裡面坐，不然我一看就知道他們在賣什麼。這是兩間競爭的百貨公司，他們知道我是懂得促銷的人，我只要走一圈就知道要怎樣贏過他們。

大概三年後（1975），我離開了時代，另一份工作就來了，在跟國民黨關係良好的東南水泥公司，董事長是陳江章。¹³好像是他們來找我的，他們要成立企劃部門，需要畫畫的人才。進去東南以後，得考慮怎麼廣告它，我想到從直升機來拍整個半屏山，看他們怎麼挖、水泥是怎麼弄的。這些工人的工作是帶一個便當跟炸彈用的器具，慢慢地往半屏山上爬，每個人爬到定位以後就開始埋設炸藥，都埋設好之後引爆，山頭炸成小塊，就可以變成水泥。但要是發生意外的話，工人會炸死。

那時我是看不到工人的，因為我的位置很高，都是搭著很高級的黑轎車。我那時也開始接任國民黨的選舉顧問，他們用這種手法養了很多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要選舉的時候，它不用你站台，光給你一張顧問的聘書，你就變成他的人。有次還有警總的人來找我，他們要找美工的人才做宣傳，對付余登發這些南部七縣市的黨外，我沒有接受。

差不多也是在東南水泥期間，我接觸到黨外運動。有一個朋友代替省議員謝三升來找我，問我可不可以幫忙黨外畫大字報，

13 陳江章（1920-1999），台灣澎湖人，1956年與鄉親洪四川、林進丁在高雄半屏山成立東南水泥公司，生產波特蘭牌水泥。見許雪姬總編纂。2005。《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澎湖縣政府，頁164。

他們帶著我去一間很秘密的房間，一次畫一個禮拜的份。在那個房間畫畫的時候，我看到有人來開會，康寧祥還來主持會議，我就感覺他氣勢不同，他的講話非常服那些黨外的人，受到很大的敬重。黨外的人比較不服從，也都沒有什麼資源，那個時候要看到黨外的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母親生病，我離開了東南水泥，就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那一年。突然知道她已經病重，我什麼都不要了，雖然辦了留職停薪，公司還是一直要挽留我。但當母親的喪事辦完以後，我還是毫無戀棧地辭職了。我這才深深地發現：想用經濟來解決我們家的問題是錯誤的，錢毫無意義，根本沒有辦法延長她的生命。

媽媽生病之前的三年，¹⁴ 家裡其實就開始有變化，我家發生了火災。那天，我跟秋雨印刷廠討論東南水泥刊物出版的事情，秋雨的人從台南開車過來時，在橋上看到我家那邊火災。我還在辦公室等他，他就打電話進來跟我說：「你趕快回家吧，你家發生火災了。」我嚇了一跳，到家時卻已經燒光了。我是我們家第一個回來的人，馬上被抓去火車站旁邊的警察局，警察還說是我縱火的。那次火災裡，所有的獎狀都燒光了，我才覺得那些榮耀都不重要。火災應該是發生在 1976 年的夏天，因為我還穿著夏天的制服。蕭清芬牧師知道了這件事情，那天晚上他就從台南開車來看我們，帶我去買一件紅色的無袖洋裝，他說我很少穿紅色的。

14 母親生病與美麗島事件同年，即 1979 年，按此推算，林美瑤家中失火的時間為 1976 年。

六、美術專業的宣教事工

東南水泥的工作結束後，我生病了一段時間，再過來台北。母親重病時就有交代我要買房子，給我們三個未出嫁的女兒住。因為妹妹國立藝專的同學王海黎的介紹，我去了救世傳播協會那邊，在大直上班。這個協會是教英文的彭蒙惠（Doris Brougham）在 1960 年設立的，它屬於中國大陸過來親國民黨的新教教派，相信蔣介石會給台灣帶來民主。一般人很少知道《救世之道》，還是比較注重《空中英語教室》，我主要是負責前面這份刊物。另外，像空中英語教室有張寫著 Studio Classroom 的手織布幕，也是我的作品。

我之所以離開救世傳播協會，也是因為壓力太大造成脊椎骨出問題，得要住院。但一直這樣也不是辦法，我又開始畫畫。因為每次教會傳道時，沒有畫面也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就畫聖經故事。我那時候在南京東路五段的松安教會禮拜，¹⁵ 我就把畫拿去松安。正好長老教會的教育幹事來，看到就問我：「這幅畫是你畫的嗎？你來我們長老教會工作吧，我們需要這種人才。」所以我就去了，成為高俊明牧師的教育幹事的助理之一，我的工作就是負責主日學教材的美編。

我後來在長老教會總會的總務室，就是在長春路八十九之五號上班。那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編每一年四月總會的議事錄，

15 松安基督長老教會，原稱「第一教會第二禮拜堂」，設立於 1978 年 1 月，後於 1991 年 3 月升格為堂會。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時間不明。〈松安教會簡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url=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2044](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2044))，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一共編了 1981 到 84 年的四本議事錄。還有佈置事務所裡的氣氛，刊物封面設計等等，我在那裡面也開始讀到羅馬字的議事錄。與此同時，我也在設計公司兼職，那是一個貴格會牧師的女兒的公司，我的第一個作品給了天母台北國際教會 (Taipei International Church, TIC)¹⁶ 的外展事工，我把它們的英文名字 Gateway 變成中國式的拱門，用來當他們的 logo (標誌)，他們也很喜歡。

在長老會時我也認識了周清玉，還參與了 1981 年義光長老教會的設立，我的會籍也遷到那邊。¹⁷ 長老會也幫忙方素敏跟林奐均去美國住，都是默默地幫忙。林宅血案發生之後，情勢變得很緊張，她們秘密住在美國人家裡一段時間，我們長老教會就跟民間募款，把他們的家變成教會。

16 該會係於 1957 年由魏樹德牧師 (Edward Knetter) 創立於台北衛理堂，原為該會會內的英語團契，1966 年會址移往中國美生總會，隔年正式獨立為台北國際教會，1974 年再移往台北美國學校 (位於今日的台北歐洲學校太古歐洲學園小學部校地)。1977 至 1984 年間，Mike Vanderpol 接替為該會牧師，在其主事期間的 1981 年設立了 Gateway 外展事工。見 Ruu-Tian Lawrence. 2017.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Church (TIC)*. Taipei International Church, <<https://www.taipeichurch.org/history>>, 2022/04/08.

17 籌備義光教會的準備起自 1981 年年底，並於 1982 年 4 月正式設立堂會。見鄭兒玉編。1982。《行過死蔭的幽谷—從林義雄律師的住宅到義光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台灣教會公報社。

七、從《關懷》走進漁港

我在《關懷》雜誌編了六期，應該是 1982 那一年，不知道有沒出現我的名字。¹⁸ 其實那時候我主要的工作不是在編輯雜誌，是在長老教會當幹事助理。在總會的時候，我就要和高俊明牧師的師母高李麗珍一起關懷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周清玉在姚嘉文入獄之後，她覺得她的英文要加強，就來找我們長老教會上課。¹⁹ 她也跟代理總幹事謝禧明說她需要人幫忙編雜誌，²⁰ 謝牧師就對我說「那你去好了」。我都是總會下班的夜間才去，弄完以後是半夜三點，我就從關懷雜誌社走回家。他們的編輯部在現在忠孝新生的忠孝公園，就在周清玉的家那裡，她家很大，所以就在那邊編。那個時候是黃宗文負責編輯。我們希望這些政治犯的家書編成文章以後，每一期都能救援一個人出獄，我們一共被禁了四期。²¹

18 《關懷雜誌》於 1982 年間出刊第二至第十一期。

19 據高李麗珍回憶，當時的家屬關懷服務，除了相互諮詢與支持外，長老教會還提供了受難家屬家庭禮拜的工作：「我們每星期都用去探監的前一晚做家庭禮拜。起初是在我家，或在其他基督徒的家庭，我家和昭輝家就輪流做家庭禮拜。後來，他們也說：『請來我們家裡。』黃信介先生娘說，去她家，甚至天福嫂也說去他們那裡，因為她的大伯也被捉。榮淑姐、姚太太、素敏姐也說去他們那裡，就這樣輪流，若是太遠的沒有辦法去，像瑞雲的弟弟有時上來參加，阿菊姐的弟弟、秀蓮姐的姊姊秀絨姐，他們都會關心、參加。」見高李麗珍口述，謝大立採訪撰述。2010。《見證時代的恩典足跡——高李麗珍女士口述實錄》。台北：台灣神學院，頁 128-129。

20 謝禧明係於高俊明因藏匿施明德事件而入獄期間（1981-1984）擔任代理總幹事，後於 1987 年赴加拿大溫哥華進行海外宣教。

21 經查國家檔案局目錄，於《關懷雜誌》第二至第十一期間，紀錄有案之遭

編完之後，我繼續待在長老教會，1984年5月開始去高雄開拓漁民的工作。當時有太多漁民被扣留海外，這些被扣留的漁民不是外籍移工，是台灣的原住民族。照理講原住民不應該在 *distant water vessel*（遠洋漁船）裡面，²² 他們是農夫比較多，或者是近海的漁業。當遠洋漁業變成大公司，它們用警察、牧師當仲介，去台東把大量的阿美族人找去坐船，介紹一個人就給一萬塊的介紹費，算是相當高，很有引誘力。我曾經跟牧師講，「你不要再仲介，那個錢變成你介紹的那個人欠你的。」他一直沒有辦法相信。老師也被仲介利用，甚至還說「我只是介紹他們去工作而已」。很多原住民不懂得漁業，他們在船上二等，另外一邊的幹部就是漢人，連語言都不同，彼此之間就是衝突。

1984年的母親節，我在臺南神學院看到有阿美族的婦女來唱歌。她說她們的丈夫被扣留，我嚇了一跳，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洪奇昌就問說我們要不要來做，那時候新潮流他們也剛開始。我因此開始 *door to door visiting*（登門拜訪）家庭訪問，那是很大的事情，當時是戒嚴，這是不可以的。我也加入了原權會，還當了委員，那時候是胡德夫的時代。²³ 但我沒有去黨外編聯會，可能也沒有加入會員，就是捐款而已。

那年長老教會還沒有正式成立漁民服務中心，我掛在 World

查禁期數為第六期、第十一期。

- 22 訪談者按：受訪者訪談時使用英文時，本文照錄英文為正文，並以括弧標注中文；某一單字第二次出現時：無縮寫者，改以中文為正文，並略去英文；有縮寫者，改以縮寫標示。
- 23 指原住民權益促進會。林美瑢曾擔任該會第二屆漢人執行委員，負責編輯第四至第七期會訊。見黃國超。2018。〈進擊的原住民刊物〉，原視界，22，頁 30-37。

Vision（世界展望會）的計畫之下，它們在旗津有一個點，工作就是照顧孩子、尋找孤兒，我成為它們的工作人員後，也開始去訪問。當時我們拿到一份名單，到底有多少人被扣留、又住在哪裡，我們有他們的住址。因為我是高雄人，我想說「這沒有問題，一下子就能拜訪完了」，沒有想到我沒辦法找到那些人。經過很多的嘗試，最後透過郵差，我才知道他們住在前鎮的 slum area（貧民區），因為好幾戶共用一個地址，根本沒有辦法找到，三十歲的我都不知道有這樣的地方。

找到她們的時候，我才了解她們的情況。從那時候開始，我大概做漁民的事情做了十年。在前鎮那條幽暗的小巷子裡，我看到一個婦人在車衣服，小孩子在旁邊哭。我想，「那不是我嗎？」忽然我就覺醒了。在那之前，我忘了我的出身，我也已經不是那樣，怎麼會突然又回到那裡？那位婦人拿了很多信給我看，她就靠扣留在異域的丈夫寫給她的信活下來。

後來我們透過長老教會的關係，找到印度孟買 YMCA 的總幹事，才知道那些原住民不在岸邊，他們是在海當中，他坐上一艘小船去那邊找他們。因為台灣沒有跟印度簽約，你經過我的地方，就要付進入該國經濟海域捕魚的入漁費；但那間公司沒有付，船員就被自己的公司扣留了。為什麼要扣留他們？就是要讓那艘船一直動，船的冰箱才會把魚冰住。這些船公司是台灣的公司，但它們跟外國沒有好的合作。這是台灣很大的問題——沒有國的問題。²⁴

24 截至 1985 年年中，扣押於印度的漁船包含：1984 年 7 月底扣留於孟買的華升 21、22 號，盟弘 21、22 號，新航 1、2 號與建泰 301、302 號，1984 年 10 月底遭扣留於馬德拉斯的聚隆 1、2 號，1984 年 3 月遭扣留於

那個時候的漁民，薪水只有三千塊，還是借支。因為他們是契約工、是分紅制度、是合夥關係，公司宣稱他們不是勞工。我們都認為漁工是勞工，但他實際上就不是勞工。不是勞工，問題就會很大。我從這裡開始組織，不過第一個組織的不是前鎮這些人，他們太散了。我先去了台東的成功鎮，²⁵ 那裡全村的男人都沒了。這些漁工裡最小的還沒當兵。兵單來了，他卻還在海上，回來以後他說他是被灌醉後帶走的。這些成功的婦女跟前鎮的婦女不是同一個部落，但是我去家庭訪問時，發現一間、一間的男人也都被扣留在其他國家。我住在她們成功白守蓮的家，那是非常美麗的地方。開始做組織的時候，清晨都有婦女都跑來坐著聽一捲錄音帶，一直哭又一直笑。因為她們講的是阿美語，我都聽不懂，聽她們說才知道：原來那是她們的先生在海上錄給她們的，他們不會寫信，所以就唱歌、錄音。她們每個人都在等丈夫的聲音出現，所以又哭又笑。

爲了工作，我也住過花蓮其他的原住民部落，每天一直在部落走，看著滿山滿野乾掉的玉米。教會的門沒有鎖，我就進去教會裡坐著，那些下課的小女生騎腳踏車過來休息一下，我問其中

馬德拉斯的鴻世號，以及 1983 年 3 月扣留於安德曼島的榮武號，遭扣留船員共計一九八人。提供協助的牧師爲南印度教會總幹事阿薩利亞 (M. Azariah)，在參與首爾亞洲教協大會後於 1985 年 7 月 5 日下午抵台，並曾派遣律師至印度馬德拉斯的法庭了解實況，也曾嘗試登船探視聚隆 1、2 號的船員。見林美瑤主編，《補漁網——五週年紀念專刊》。高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頁 163-170、174-175。

- 25 關於實地探訪成功原住民漁工婦女的經過，見林美瑤。1991。〈被扣船員家屬專訪記實〉。收錄於林美瑤主編，《補漁網——五週年紀念專刊》。高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頁 28-31。

一個小女孩說，「妳幾年級了？」她說，「明年就要小學畢業了。」我又問，「妳有什麼計畫？」她說，「我們沒有什麼計畫，如果嫁給老兵，那我就去都市。沒有辦法，我們就是這樣的。」接著唱歌給我聽，唱完就騎著腳踏車回去了。每當鳳凰花開的季節，她們都被等在校門口的巴士載去都市工作。我覺得心很酸，怎麼這些女孩這麼可愛，快快樂樂的，卻只能這樣子才能活下去？

我在白守蓮還訪問過別的教派的牧師。我說，「牧師，我有很多受苦的會友的名單。」結果他卻說，「這裡面沒有我的會友。」他很冷漠、都不關心，我也是嚇了一跳。那位牧師也是原住民，是沒有覺醒的一般人。你沒有覺醒，就會壓迫別人，也不知道你在壓迫別人。牧師覺得他是在幫忙他的族人介紹工作，哪有虧欠他們？他成為仲介的一環，讓原住民的女兒被賣去當雛妓，男孩被賣去當漁民，他把小女孩跟小男孩送到虎口，不只完全不自知，還收到利益。

做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想要怎麼樣去抗議。最開始先有一個船的主題，對象是哈瑪星的船公司，我在白布剪成的衣服寫上「還我丈夫」、「還我哥哥」、「還我兒子」等等。接著是組織的工作，我要陪著她們，還要保持秘密、不能到處張揚。所以我先到台東住，跟她們一起搭客運車從台東到高雄，到高雄又坐巴士，去到了旗後教會。

我那時候住在旗津的一間辦公室，是一位教會會友的房子。從高雄坐渡輪過去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漁民服務中心」的大字，²⁶用黃色的底、黑色的字寫在一面牆上，非常醒目。這個漁

26 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前身為 1985 年組成之漁民關懷小組，提供漁民

民服務中心就在魚市場旁，一樓是鐵工廠、二樓是辦公室，三樓則是我住的地方，旁邊是魚市場。她們第一次來抗議的時候，我非常緊張，我一直希望有教會的人幫忙，可是他們都遠遠的，但我還是要面對。

有一次我們去找高雄很有名的船公司，這間公司要是有船沉了、要賠償，老闆就把這間公司變成全部只剩一艘船，讓自己能夠逃避責任。他們宣稱，「我的船都沉了，我怎麼能賠你？我也是受害者啊。」我聚集這些媽媽到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農委會、警總的人都來了。我說，「這些媽媽們都不要錢，只要丈夫回來。她們的丈夫在你的船上工作，現在失蹤了，你讓他們回來就好了。」她們全部哭成一團，那還得了？船老闆看到我這個長老教會的保護傘就說，「長老教會算什麼？那個人不走我就不開會。」這些家屬是我找去的，他想說把我弄開，她們就沒有組織力了，一下子就可以用錢解決。家屬就講說，「好吧，妳先離開一下。」我也很大膽，說聲「好」就先離開。當時的南警總非常有名，他們站在船公司的立場，一直要阻止我們。但最後我們還是完成了，讓一半的漁民回來，他們的薪水也從三千變成六千。後來我們覺得這樣不夠，就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拿印度的案例讓大家討論台灣漁民的問題，另一半剩下的人一直到很久之後才回

家庭急難救助、關懷慰問與逐戶家訪、成立常設機構（發行刊物、法律諮詢、舉辦講習會）等三項服務。後於1986年5月正式成立為中心。林美蓉自1985年7月起正式聘用，曾於該中心擔任執事（1985年5月至1987年6月）、委員（1988年5月至1990年4月）與主任（1990年9月至1991年4月）等職。見林美蓉主編。1991。《補漁網——五週年紀念專刊》。高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頁201-203、219。

來。

那是戒嚴的時代，漁民服務中心掛在長老教會下，我也在這支 *umbrella*（保護傘）的保護下，才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仍然很危險。後來我們走路到高雄市政府前面舉牌，我雖然知道這是會被政府忌諱的行動，但是誰跟她們站在一起呢？這不就是我的責任嗎？我要跟她們在一起。後來我漸漸跟 *Urban Rural Mission*（*URM*，城鄉宣教）有了很多接觸，讓我想說：為什麼人在 *urban*（城市）的地方會那麼受苦？因為你在你住的 *rural area*（鄉村區域）沒有辦法找到工作，所以你就到了城市的地方要去尋求一個 *better life*（更好的生活），結果你就進去監獄了，它們是相連的。同樣，你可以擴大到是：一個還沒有發展的國家的人，要進到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你也是進入痛苦裡面，所以這個工作很重要。

我的思考特別集中在 *participate people's suffering and struggle together*（參與人們的苦難和一起奮鬥）。你不是只有講，你要分擔，很多人他不是。經過好幾次的抗議，我發現那些媽媽非常勇敢，她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得住在漁民服務中心的樓上。要是警察突然來臨檢辦公室怎麼辦？這些媽媽就講說她們信任我，一定要跟我一起。警察來了，就都把身分證拿給警察抄，她們不怕。

八、工人教室的實踐

我至少有五年一直住在旗津那邊，直到解嚴之後。1987年，

我同時在做漁民服務，但也想說來弄一間工人教室，跟台灣工聯會一起。那時通往旗津的海底隧道通了，²⁷ 聯結車工會的人就在小港這端的入口租了一間可以停車的房子，²⁸ 設了一間賣檳榔、賣簡單的麵的店，我就租了樓上。我那個時候常常跟漁民有接觸，大概是這樣的關係，我跟工聯會了這樣子的構想，他們很高興，也希望能夠有組織、有讀勞基法，我就決定辦了一間工人教室。裝飾教室的字都是我用紙剪的，那間教室的椅子矮矮長長，排滿了二樓，一張椅子大概可以坐兩個人。我找了台塑南亞廠的員工來上課，賴幸媛也推薦過蔡建仁來講勞基法。上課的多半是男的為主，女的都沒辦法來上，我後來就用別的方法組織女工。

只要有抗議找我，那時的我就會去聲援。像是海山煤礦，我們都會上去聲援；或像南亞的案子，所以我才認識被解僱的南亞工會幹部顏坤泉。我不會拉很多人上去，看起來好像沒有組織力，但就是會做。透過聯結車工會，我可以接觸到對組織有興趣的人，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因為一定有 spy（間諜）會跑來，我也是非常小心的。那時解嚴沒多久，是不允許聚會的，但是那些工人都很想討論法律。我也有主動去過加工區，就是這樣接觸，把他們帶過來。我有時也會下樓吃麵，就會聽工人他們的對話，要是覺得這個人可以，就把他帶上樓。「可以」的意思是：

27 指高雄港過港隧道，係於 1984 年 5 月完工。

28 指高雄市聯結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最先是在 1987 年 8 月組織聯誼會，並在隔年正式成立。見高雄勞工博物館。2020。〈高雄市聯結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楊國煥理事長口述（一）〉。國家文化記憶庫 ([url=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08080&IndexCode=Culture_Media](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08080&IndexCode=Culture_Media))，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28 日。

他真正是個工人，可是他有很多東西想突破，他覺得他很認真，卻想不通為什麼有那麼多困難？這就是要讓他突破的點，去發現他的困境在哪裡。

上課的內容多半是以勞基法為主，我負責介紹跟提供場地，都是工人來上課。其實那應該要算是分享經驗的交流會，這樣工人比較不緊張。我用這個方法，是因為我深深了解韓國經驗的意義：沒有人能夠領導別人。工人們彼此交流經驗、互相扶持，談一晚都談不完，他們覺得非常有意思，「原來我們那麼像」。我們每天都辦交流會，每次大概有二十個人，有工會幹部、也有基層工人。那時候我剛好結束了一間在高雄中正路的英語教室，我是負責人，是姓劉的英語老師弄的。

工人教室的場地費用是我自己出的，其實也沒有花多少錢。我不會做花很多錢的事，因為我生長在工人家庭，所以我很知道怎麼樣說工人的語言，怎麼樣才能夠永續，你不能夠大家大吃大喝，完全非常低調。工人教室大概持續了一年多，很快就形成固定班底。我沒有這些人的名字，我不問他們，我也不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因為會被搜，要非常小心。問題不在我要出名，問題是工人要成長；不是我要很多嘍囉，我不需要。而且我有了他們的名單，反而非常危險。我被抓的時候會被逼問出來，這是不可以的，一定不可以，我不允許這樣子。他們會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重點不是我知道他們，他們知道我就好了，這個是在戒嚴下面的組織者的概念。

這個做法也可能跟我的個性有關，以前我們家左右鄰居都是政治犯，所以我非常小心。而且我一直想：我不要被捕，我要做很久。我不是要出名，想的都是 Benefit to whom？（對誰有

利) 這個很重要：做事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他們？我常常想這個東西。大概到 1988 年，我太忙了，開始進入國際，已經要做基層婦女勞工。而且在那之前，我已經是 URM 的聯絡人，我的薪水是從香港亞洲基督教協會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CCA) 來的。²⁹ 我成立漁民服務中心，就有一點薪水，大概五千塊。到那時候開始有 CCA-URM 的另外一個工作，我要安排可以訓練的人去開國際會議。

九、參與長老教會城鄉宣教

URM 觀察發現：台灣只重視美國跟日本，不重視亞洲的國家，可是亞洲國家的經驗對台灣是重要的。他們就對我說：應該要找人去參加亞洲國家的會議。那是從 CCA-URM 開始，負責這個單位的幹事是韓國人權皓景 (권호경, Kwon Ho-Kyung)，³⁰ 我是在 WCC 的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普世教會協會)

29 該會係一超教會的運動團體，總部設於新加坡，下轄九個部門。其中，國際事務委員會與 CCA-URM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 Urban Rural Mission, 亞洲基督教協會—城鄉宣教部) 兩部設於香港，其餘的神學基督教教育等七個部門設於新加坡。見權皓景。1987。〈亞洲城鄉宣教歷史〉。收錄於《台灣基層事工：第一屆基層事工研討會專輯》。台北：山地勞工福音之家、彩虹婦女事工、漁民服務中心、勞工法律支援會，頁 6-8。

30 權皓景係於 1986 至 1989 年間參與 CCA-URM 的工作。其參與經驗可見權皓景 (권호경) 口述、奎洪妍 (연규홍) 訪問。2010。〈權皓景訪問紀錄 (권호경)〉。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當代韓國口述歷史檔案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은 - 현대한국구술자료관의), ([url=https://mkoha.aks.ac.kr/](https://mkoha.aks.ac.kr/))

sub-region meeting (分區會議) 認識他的，我常常去接受了韓國半個月一次的訓練，也開始了我許多的國際參與。

當我在做漁民服務的時候，我寫過英文的報告，應該是在 1986 年 4 月 WCC 的 Asian youth meeting (亞洲青年會議) 上發表，開會有在日本五天、在南韓五天。韓國方面的人對長老教會說，他們要找的是真正的工作人員，我們派了牧師跟他的助理，他們其實沒有基層的工作經驗。WCC 還是希望一定要有工作人員去參加。那時有個青年幹事吳哲雄，因為我一直在《教會公報》寫漁民被扣留的文章，他堅持要派我去，甚至還跟青年主委盧俊義爭取。³¹ 我們長老教會就是以社會服務為信仰，他不是只在教會禮拜，而是一個實踐的教派。但真的幾個人可以這樣子實踐？很少。我可以說是第一個人，所以他們非常驚訝。

這次會議是我第一次提出關於漁民的報告，我就想帶十本報告過去。可是帶不了，怎麼辦？我就想到：用非常漂亮、有中國味道的 A4 紙，包得像個禮物。我到飛機場要被打開檢查時，就說這個是要送給一位非常喜愛中國文化的長輩的禮物，你要是拆了，我就要丟掉。我得要冒險，他就讓我拿回來。那時候的我很清白，他們不知道我是誰。帶出去後，這本書讓權皓景驚訝起來，他說，「台灣怎麼有這種事，我們都不知道」。

我到日本開會的時候，到了大阪一個都是日雇勞工的區域，這裏是二戰之後許多沒有結婚的老兵住的地方。那些工人每天就在等那一份工作，他們在工廠的旁邊露宿街頭。可是建築物旁邊

oralRecord/OralRecordSelect.do?subjCode&cpage&oralRecSeq=163)，檢閱日期：2022 年 4 月 8 日。

31 盧俊義係於 1982 年擔任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主任委員。

都會故意鋪上鐵片，讓你不能緊貼著牆，得斜斜地躺，甚至躺到馬路上。而且要是太靠牆壁，工廠還會把你趕走，讓你不能睡覺。我看到有一位日本牧師，在一個小小的三角公園成立了一間餐廳，專門給這些勞工吃飯。這些工人自己有工作時就會分享，把飯分給沒有工作的人。這位牧師也是，他知道這些工人會分享，給的飯也特別大碗。

我問這位牧師說，「你們都要做些什麼？」牧師說，天氣很冷的時候，工人可能會凍死在街頭，他們還要幫忙收屍。可是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日雇工人，在他自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之後卻不會分享。你就知道：人性是在痛苦的時候才會激發出來。當他自己最痛苦的時候，才會想到要彼此合作。

台灣 URM 的負責人是林宗正牧師，他先辦了一個 URM 的 Canada Urban Training（加拿大草根社區組織者訓練，CUT），³² 先去加拿大跟日本訓練。Albert Lin 後來也介入這個訓練，³³ 他就

32 林宗正係於 1985 年赴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地接受 URM 訓練，返台後接任 URM 主席。見邱斐顯。2013。〈警總查扣七路聯軍索公報——台灣牧者傳奇林宗正（3）〉。邱斐顯部落格 ([url=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13/01/3.html](http://felicitychiu.blogspot.com/2013/01/3.html))，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邱萬興。2015。〈上帝派來的街頭戰士——林宗正牧師〉。民報 ([url=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574e1efb-6a25-40ca-8a49-4b3fcb033bed](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574e1efb-6a25-40ca-8a49-4b3fcb033bed))，檢閱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33 即林哲夫，1960 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物理學系期間，參與海外台獨刊物《台灣青年》、台獨聯盟等組織。1982 年參與加拿大普世教協（Canda Council of Churches，CCC）下屬的加拿大草根社區組織者訓練班，隔年在多倫多成立台加草根社區組織者訓練班（Taiwanese-Canadian Urban Training，TUCT）。1986 年，訓練場地移師日本樺木縣那須塩原市的日本亞洲農村學院（アジア学院），當時的主要參與者包含廖碧英、吳錐等十餘人，返台後主要推動的議題為救援雛妓與原住民正名、還我土

是說台灣要獨立。我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台灣的 URM 訓練，權牧師說這會給台灣帶來危險。我後來聽去參加的別的人說，他們訓練很多次，大家都對台灣獨立充滿熱忱，活動的最後要拿一根蠟燭，說「我決定為台灣而死」，所以政府就很注意。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我也不曉得實際的情形。

他們最大的運動，就是把吳鳳銅像弄下來。但是拉倒吳鳳銅像時我也在那裡，真正做的不是他們，是我們原權會。清晨的時候，我跟胡德夫、伊凡·尤幹（Iban Nokan）碰面，他們寫了那些字條，先有前置的準備工作，才有後來把吳鳳銅像拉下來的事。但 URM 把這件事情說成他們弄的。³⁴ 我們在這之前開了好幾次會議，他們都沒有參加，原權會沒有講，我也認為不要講，因為會帶來危險。你那麼高調，怎麼可能躲過戒嚴令？這件事情是國家所不容的。

我去參加國際會議時沒有人知道，因為我不是高調的人。結

地運動。見林哲夫、方嵐亭。2017。《感恩、執著、台灣建國路——林哲夫》。台北：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頁 224-236；鄭國忠。2017。〈城鄉運動的功能與實踐〉。收錄於施正鋒主編，《使台灣不再被征服：柔軟國力的發揮》。台北：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頁 102-115。

- 34 指 1988 年 12 月 31 日中午拉倒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的行動。根據 URM 組織者黃昭凱的說法，該次行動的「實際參加者包括原住民、長老教會、台南新而獨立服務處、翁金珠服務處，及第九期 URM 的學運成員，全部只有三十餘人。」一早進行拆除的準備是，「在黃昭凱（台南市黨部執行長）、林宗正牧師、戴振耀（高雄農權會會長）等人協助下，原住民很快就完成拆除行動的部署工作，準備進行摧毀銅像的行動。」見黃昭凱。2002。《URM 與台灣社會運動——從吳鳳事件談起》。台北：編者自印，頁 2、6。

果我回來的時候卻全身被搜，所有的資料都被拿去影印，一定有人告訴他們。我背著背包，帶了整箱從 CCA 拿回來的外文書。那檢查的三個人一本一本地看，看我的筆記，但我的筆記又是英文、又是羅馬字，還畫了很多畫，影印了他也看不懂。我就就讓他耗，讓他去印，在飛機場耽擱了很久，就不能進來台灣。但是，應該沒有人知道我是坐那一班飛機，為什麼他們知道？所以後來我格外小心。

我安排的訓練跟加拿大城市訓練他們完全不一樣，是真正地在亞洲的訓練。我送出去的人會由 CCA 安排到泰國、柬埔寨、菲律賓，都是我們很少接觸的國家，這之前的台灣人都是去日本、美國為主。CCA 認為這個部分非常重要，韓國的運動者很強悍，他們不相信美國人跟日本人，就算用了日本人、用美國人，也不讓他們坐重要的位置，而是自己掌握。韓國的遊行也不讓人家拍照，他們的運動者說：「你拍我，我知道你是誰；但是你照片出去，政府就可以當做證據抓人。」這點我們從來沒有注意到，反而把遊行弄成嘉年華。

我負責安排台灣的人去受訓，當中一個最有名的就是戴振耀，後來在農運上很有成果。我安排他去的那一次訓練，足足地去了半個月，回來之後他非常全然地改變。很多人問我，我都不講這件事，可是戴振耀一直會跟人家講，不過他們聽都聽不懂。

我參加遊行時，曾經聽到領導人說，「我們今天這個事情沒有解決，我們就死在這個地方。」結果五分鐘以後他就離開了，你這樣是對自己開玩笑。我不會講這種蠱惑群眾的話，因為這種事你心裡要有準備：我今天參加這個遊行，我可能就會在這個地方被捕。但這不見得要說出來，如果台灣要改革，也不是用這種

話語，而是實際行動。這種話語不能講，會講的人就是有問題。後來我就發現，原來台灣的運動一直被這種很會表演的人控制。

我成為漁民服務中心的主任之後，我的 staffs（工作人員）他們都去受訓。因為 CUT 的影響，他們回來每個人都寫了一份計畫，執行者就是別人。他們很空洞，後來我才知道這跟 Ed File 有關。³⁵ File 是一位學者，他懂得分析，像是分析出今天我們社區裡面有人被賣了，就有一個仲介者，有鄉長、有老師。你學會了分析，會發現原來是這樣：我們要打壓仲介者，讓他不能生存在我們的社區，就可以解決人口販運的問題。可是執行的就是別人執行，他們不會，他們是理論派。我看到我的職員去寫這個分析，也跟他們說：你們這個太理論了，你想想你自己要做什麼，你怎麼能夠想不出來？

我慢慢地瞭解到：原來 Ed File 是娶了一個原住民的太太，他本身就只是一個有名的學者。知識份子去幫勞工，但他始終不能替勞工做事情。我之所以跟勞工會很結合，是因為出身自工人家庭，我整個身體是那樣的，整天就是生活在工人的世界裡。雖然我有讀書，可是我不會變掉原來的基本。假設你沒有經驗，你很快會以為你可以做很多事，其實是不行的。要團結才對，不能是一個人、一個人做的。

35 即耶得嘉·費爾(Edgar File)，八零年代初期與林哲夫共同引進加拿大草根社區組織者訓練班的訓練方法(Canadian Urban Training Project)，伴侶為加拿大莫霍克族人、人權行動者 Donna Loft。見耶得嘉·費爾。2017。〈民主及人權戰場上一個完美的典範〉。民報([url=https://www.peopledmedia.tw/news/1de5c998-6537-42f7-a788-193403a031f8](https://www.peopledmedia.tw/news/1de5c998-6537-42f7-a788-193403a031f8))，檢閱日期：2022年3月19日(吳銘恩譯)。

十、對韓國工運的觀察

我把韓國女工找來台灣，應該是快要成立基層婦女中心的時候。在這之前我就去過韓國很多次，我才發現我們在台灣過得太好了。去韓國時，我被安排住在一位女工家裡。以首爾為中心，旁邊是工業地帶，首爾則是一個比較商業的都市。那位女工的房間就在廚房旁邊，房間比較小，是一點五坪大，大概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二，跟她睡在一起的時候不能平躺，是我的頭對著她的腳、我的腳對著她的頭，兩個人這樣側著身子才能睡覺。因為是人家廚房，那裡不能洗澡，後面有一條小小的巷子，我們就遮著，燒了水就在那邊洗一洗。我再怎麼樣都沒有那麼壞地生活過。

平時，那個女工就找了間小小的、小小的咖啡廳，擠了五、六個人，大家也只有叫了一杯飲料，從早上五點開始一直在讀勞基法，這是怎麼樣的辛苦？讀完以後的中午，換去一間比較大的教會，開始學敲鼓，「孔噠、孔噠、孔噠噠噠」。中午過後又有另一批女工來上課，又是讀勞基法；晚上再另外一批人來讀勞基法。讀完以後累得要死，回去也沒有辦法睡覺。我想說，「怎麼會這麼樣辛苦過日子？到底在為什麼？」跟那位女工的語言也不通，我覺得很痛苦。經過像這樣子的一次 exposure tour（體驗之旅），我才發現，我根本沒有辦法做工運。他們也安排所有的工人全部一起開會，有人在畫出我們為什麼聚集；大家也唱南北統一的歌，他們是連政治的歌也唱。

韓國對工人跟工人間的連接非常重視，我參加過他們的抗議。比如說到了一間工廠，外面全部都關起來，上面寫罷工第二

十一天，工人在裡面埋鍋造飯，非常地強悍。從 1985 年一直到我做婦女的 88、89 年之前，好幾年都要去受這種訓練。這些訓練是權牧師安排的，所以有各種接觸、很多的體驗之旅，有次要坐車到很遠的一個地方，我看到整片海藻地，有工人、女人在那邊撈魚來吃。我看到以後感到非常無力：他們在找什麼呢？這麼一片泥沼地，他們怎麼撈得到呢？

這讓我感覺，韓國怎麼那麼像台灣？上街的時候都有那麼多的警察拿著槍，我們像是活在金大中以前的那個時代。這對我震撼非常大，我也因為這樣變得非常小心。當然我也被搜過，全部的書都被收走，這之後我要是跟人家有約，不會一直在那邊講電話，反而都簡單地講，因為可能被監聽了。然後看約在哪裡，我們就站那裡在講，大概是這種敏感。因此對我來講，韓國經驗非常重要。

十一、基層婦女後援會的成立

後來的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最早叫做基層婦女後援會，是曹愛蘭、陳菊跟我三個人一起開始的，我們的辦公室就在博愛路的所謂「婦女聯合大樓」。我原本以為靠近火車站，女工就會來找我們，其實不然。1988 年，我們跟 CAW（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亞洲婦女委員會），也就是 Asia Woman Worker Newsletter（亞洲女工通訊）合作，把它們的東西翻譯成中文。CAW 是 URM 下面的女性勞工組織，南亞、日本都有人參與。成立時，我還辦了一場世界人權宣言頒布四十週年紀念的人權日

活動，每天談一種人的人權，像勞工人權、婦女人權、殘障者人權，活動最後一天還有遊行。

我會成立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是因為 WCC。它們問我，「妳離開 URM 的工作以後要做什麼？妳有沒有思考過？」我說「沒有」。它們又說，「妳就是要做基層婦女，其實妳做漁民的時候也是在做基層婦女，台灣沒有人做這個。」就給了我六千美金。WCC 的 yearbook（年鑑），竟然把我的名字也放在裡面，這是一項很正式的資助。

可是在台灣要怎麼組織呢？我邀請了教會的人，但就是沒有辦法。跟韓國一樣，雖然有工人教會，但是它們並不支持工人，因為教會都是中產階級為主。我雖然召集會議，但教會的人也不敢明講他們不能支持。有教會的組織——也就是說——有委員會去募款的話，你就可以一直做這些事。像我們教會裡面有個婦女事工委員會，也成立了很久，可是也沒有實際的效用。雖然沒有教會組織的幫忙，既然我有這個責任，就得要自己想辦法。我沒有在傳教，只是做讓女工覺醒的教育，就像我自己也有覺醒。我如果沒有覺醒，也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大概是在很好的辦公室做我的設計，過非常優厚的生活就好了，怎麼還去關心這些。

我原本想發展成女子勞動者協會，後來沒有促成。如果你只是後援會，是 supporting group（聲援團體），你就只是 non-governmenta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非政府的聲援組織）；但是我要的是 people's organization（民衆組織），people 就是指 woman worker（女工），不是 supporter（聲援者）。根據我們的法律，組成團體要提出三十個人，要是我提名真正的女工，她們就完全沒辦法在工廠裡生存了。縱然我的思考是純正的，台灣到

現在還是不允許。³⁶

我出身勞工，我做勞工的事。原來我在南部，南部的人非常單純，我想到了臺北大概可以有橫的聯繫。假設我們在婦女大樓辦公，有我們基層婦女、有婦援會、有婦女新知、還有進步婦盟，又有國際特赦組織，大家可以串連。但是那個時候我就發現是沒辦法的，因為知識份子看不起基層婦女。我後來才知道是她們誤會了，誤會我是中研院的林美容。在做彭婉如基金會的時候，我就被發現了，有人跟我講：「妳可不可以退出，我們要找比較會募款的人來參與。」我才恍然大悟。可是彭婉如也是我的朋友，她遇害以後，到現在都還找不到兇手。

我當基金會的執行委員也是要募款，是有 quota（配額）的。我們婦女勞工已經很辛苦，都沒有向妳募款，我還要幫妳們募款，妳們知識份子做事情是很奇怪的。當時基層婦女中心要租那間房子，婦女新知是「老大姐」，我就把德華女子公寓的木頭衣櫃、書櫃送給她們。德華那個時候剛好結束，³⁷ 袁嬿嬿問我書櫃要放在哪裡，我就送給婦女新知，我們找了許多民進黨黨工來幫

36 參考亞洲婦女勞工通訊地址與發行者的變化：試刊號（1988年11月發行）設址於健康路，發行者為基層婦女後援會；第一期（1988年12月發行）改設址於博愛路；第二期（1989年1月發行）發行者改為台灣女子勞動者協會；第三期（1989年2月發行）地址再度改設回健康路；第七期（1989年7月發行）刊行時標註：「1989年7月因財務狀況及人團法規規定停刊，不再對外接受訂戶，基層婦女勞工委員會繼續推動基層服務工作。」；第八期（1990年1月發行）發行者再改為基層婦女勞工中心。

37 德華女子公寓，係由天主教聖言會萬德華神父（Edward J. Wojniak）倡議興建，1968年完成第一期工程，1988年正式停業。見吳蕙芳。2015。〈天主教聖言會的社會服務事業：以新店大坪林德華女子公寓為例（1968-1988）〉。政大歷史學報，44，頁223-280。

忙搬。雖然我們在婦女大樓是打算橫的聯合，後來我也沒有租了，退出以後我回來健康路，那應該是 1989 年。

十二、台韓女工間的交流

看到新埔製衣工會成立之後，我覺得得要聲援，那已經是 1988 年年底了，我是 1989 年去跟新埔的女工聯盟的。1989 年 3 月安排韓國女工來交流的時候，我已經接觸過很多勞工，新埔是其中一個。我才發現原來女工的語言都跟工作有關聯，雖然她們是不同的人，但她們的語言是一樣的。

1989 年 3 月，我通過 CAW 聯絡韓國的女工，請她們來台灣交流。³⁸ 韓國女工的訪問之後，我就開始帶新埔的女工教室，4 月開始我去了好幾次，都是以女工為主。交流對這些遠東的女工形成很大的激勵，我接著辦了女子宿舍的教室，讓大家拎著食物一起來吃吃喝喝，大家在宿舍那邊討論，把嚴肅的問題生活化。

我只負責引題。比如她們說，「我們的方式不能只是在桌上談的。」我就會問，「妳的耳朵都聽不到，是什麼原因？妳工作的地方是怎麼樣？」她接著說，「工廠非常吵，整天都是有聲音的，是機器在動的聲音，我就一直聽，就越來越聽不到。」我問她，「燈光怎麼樣？」她說：「我都看不見，手也很痛。」原來她拉俾

38 此一交流的內容，見林美蓉。1989。〈工會幹部問答篇〉。亞洲婦女勞工通訊，6，頁 5-6；彭婉如。1997。〈女性勞工帶頭做先鋒——五一勞動節有感〉。收錄於胡淑雯、張娟芬、劉慧君、鄭至慧、蘇芊玲編。《婉如火金姑（上）》。台北：女書文化，頁 198-202。

的機械很重，是體重的十倍以上，手都受傷了。從這些很小的地方開始，讓女工去思考怎麼突破，讓她們發現這都是可以改善的。妳的問題讓大家一起來解決，把這件事情再帶回到工會去討論。這樣一來，她們就可以講：我也有這樣、你也有這樣，大家都是這樣子，我也可以去做一些改變，就可以很務實地改革。

A 工廠組織好了以後，我把 A 工廠的幾個人帶到 B 工廠的宿舍去做同樣的事。她們有改革的經驗，把這個經驗再帶到另外一間工廠，B 工廠的人能夠很相信她，大家也都會很相信我。我甚至帶著我的小侄兒一起去，像我們這樣女人間的交流，工廠都不會防範，我看起來就跟大家一樣。重點是讓她們瞭解、成長，而不是去報導。後來我發現，A、B 跟 C 的女工一直成長起來，就會知道怎麼運作。等她們進到工會裡面，縱然工會裡都是男的，也可以有婦女的聲音，這就是我後來的作法：讓她們自己去發展。

這些婦女的勞工她們不只是婦女了，已經開始覺醒了，她們有自己的工會，這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透過婦女聯誼會培養的一些女工，後來都是工會的幹部。覺醒了以後，當然跟知識份子是不一樣的，她們非常地彼此幫助，不會覺得自己好就好，她們的生命是彼此分享的。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意識的啓蒙，基層婦女的尊嚴是來自自己。她們每天的生活就是掙扎，在掙扎的裡面想要找出出路，你就幫她找出一條出路就好了。她生命的重點不是成爲英雄，因爲工運沒有女性的空間，工會都是男性的工會；而且，她們的家人也不會允許她出頭露面做這些事情。每一次運動的時候，我都會把女工帶回來我這裡，教她怎麼樣繼續運動下去。至於我個人，

不會想搶一個舞台，我不會需要舞台，我需要的是工人自己能夠站起來，能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我就是你們當中的一個，我們一起找出一條出路，這是多麼不一樣的！